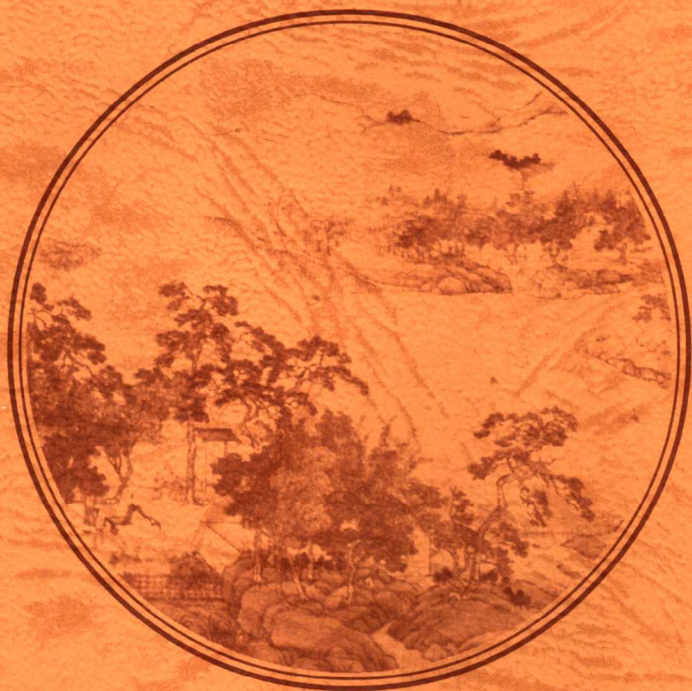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曾国藩日记



京华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文白对照全译

曾国藩日记

〔清〕曾国藩 著

〔清〕李鸿章 著

赵丹 李 鸿 等编译

● 上 ●

京华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文白对照全译

曾国藩日记

京华出版社

K527.52

7182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文白对照全译

曾国藩日记

京华出版社

1/15/8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日记 / 曾国藩著. - 北京: 京华出版社, 2000
(中国古典文化精华)

ISBN 7-80600-497-1

I. 曾… II. 曾… III. 曾国藩 - 日记 IV. Z429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7421 号

曾国藩日记

责任编辑:刘 明 责任校对:李 阳
技术编辑:李卫星 封面设计:印象工作室

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 1 号)

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48.75 印张 1102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0001 - 15000 定价: 59.80 元(全三册)

ISBN 7 - 80600 - 497 - 1 / I · 76

出版说明

曾国藩一生著述甚多，真正流传下来的，只有他的《家书》和《日记》。

——题记

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原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人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进士。1853年奉命帮办团练，扩编为湘军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。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企业。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两江总督。著有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

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，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。他的文韬武略，他的道德修养，令许多后人推崇。梁启超曾经说过：“曾文正公，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。而吾则愈崇拜其人。吾以为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，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。……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，苟有此志，则吾谓《曾文正集》，不可不日三复也。”梁启超还把曾国藩看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他认为曾国藩：“……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三并不朽。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比肩者。其一生在立志自拔于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虽百千艰阻而不挫屈。不求近效，铢积寸累，受之以虚，将之以勤，植之以刚，贞之以恒，帅之以诚，勇猛精进，卓绝坚苦，如斯而已。”近代有学者把孔子、朱熹、曾国藩三人在儒学上的成就并列，认为：孔子集三代儒学之大成，朱熹集秦、汉、唐、宋儒学之大成，曾国藩集宋、元、明、清儒学之大成。曾国藩被人看作是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，建树功业，转移世运的伟人贤者，清咸同中兴的第一名臣。也有人骂他是民贼、元凶，是草菅人命、擅权滥杀的“曾剃头”，好名失德的“伪君子”。曾国藩曾重兵在握，权倾一时，功高震主。他完全可以取满清之天下而代之，自己做皇帝。但他不肯取天下于寡妇孤儿之手。有人据此批评曾国藩薄帝位而不为，使中国的现代化被清王朝耽误了五十年，这笔帐似应记在曾国藩身上……。

曾国藩其人其文似乎是个说不完的话题。令读者称道、发行量甚广的《文白对照全译〈曾国藩家书〉》中称曾国藩的著述：“……真正流传下来的，只有他的《家书》和《日记》。”本文将对曾国藩其人和他的《日记》做个简

要的介绍，以飨读者。

曾国藩的家庭教育

曾国藩家世代业农，原居湖南衡阳，自清初迁居湘乡，仍以农为业。他的祖父曾玉屏，原来也是一个普通农民，且平生读书无多，然其嘉言懿行，足以感召全家，曾国藩所受影响尤大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，是一个读书人，可是读了一辈子书，考了17次，直到43岁那一年，才考中秀才。于是设馆课徒，历二十余年不懈。国藩自8岁起，即随父读书，曾麟书管教极严，除塾内课读外，随时随地严加教诲。曾国藩的母亲，个性倔强，善事舅姑，嘉惠亲族，敦睦邻里，这一家的家风美德，于有形无形之中，对于曾国藩的学问功名，均有极大的影响。

曾国藩的家庭教育，可用两个八字概括：

第一个“八”字，便是八本堂。咸丰十年二月，正是曾国藩反守为攻的大战时期，这位统兵大帅，却一面辑录经史百家杂钞，一面作书寄家，告其所居曰八本堂：

读书以训诂为本；
诗文以声调为本；
事亲以得欢心为本；
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；
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；
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；
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；
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

这八个本字，是曾国藩的立身之本，也是曾国藩家庭教育的原则。曾国藩终身行之不懈，亦愿其子弟终身行之不懈。

第二个“八”字，便是书、蔬、鱼、猪、早、扫、考、宝八字家规，曾氏常戏称之为治家的八宝饭。一个家庭有了这个八宝饭，即是吃不完用不完的聚宝盆，可以传给子孙后代。

按曾国藩的家庭教育，以八本堂的八字为经，以八宝饭的八字为纬，经纬连贯，脉络相通，便形成一套治家的理论体系。千百年来，中国谈家庭教育者，未能出其畴范。因此，曾国藩的家书、家训及记载有两个八字的日记，便流行民间，至为广泛，等于一部家庭教科书，几乎无人不读。

此外，曾国藩对于妇女之教，亦极注意，常谓“古来世家久长者，男子须讲耕、读二事，妇女须讲求纺织、酒食二事。”又云：“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，验之于内眷而毕露。”

曾国藩的道德修养

专门教诫子弟妇女，而自己不能以身作则，身体力行，这样的教诫，收效至鲜。曾国藩一生最能感人之处，便是能说能做，说了便做，不说也做。言教身教，同时并行，起一种示范作用，且看曾氏的方方面面。

生活

食：曾公每食只蔬菜一品，绝不多设。虽身为将相，而自奉之啬，无殊寒素。时人以其每食只菜一品，因呼之为一品宰相。

曾公任两江总督时，曾巡视扬州一带。扬州盐商，以总督至，特别盛宴。山珍海味，罗列满桌。曾公仅就面前所设数菜，稍食而已。退谓人曰：一食千金，吾不忍食，且不忍睹。

衣：公秉性节俭，平时不讲究衣帛，三十初度时，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，家居不轻着，惟遇庆贺及新年一着之，其衣藏之三十年，犹如新也。

住：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，已百余年。曾国荃以家中人口增多，另建新屋一栋，费资三千馀串。曾公闻之，大不高兴，去函责弟，谓新屋落成之后，搬进容易搬出难，吾此生绝不住新屋也。两兄弟都任总督，花了三千多串钱，便发誓不住新屋，并谓搬进容易搬出难，所见至为深刻。

工作

曾公每日自晨至晚，不断工作，不稍歇息。主要公文，均自批自拟，很少假手他人。晚年右目失明，仍然阅公文，写作诗文日记。他所写日记，直到临死之前一日，才停止。

他自己工作，他的夫人，住在总督署内，也要织麻纺纱，做针线工作，直到起更后，始能休息。曾公任直隶总督时，执意清理狱讼，重大案件，均亲自审讯。半年之间，结案四万一千馀件。多年尘牍，为之一清。举此一例，即可知其工作之勤矣。

读书

曾国藩自幼至老，读书之勤，世所罕见。道光二十二年，曾自订十二种功课，力行不懈：

一、主敬：整齐严肃，无事时心在身子里。应事时，专一不杂，如日之升。

二、静坐：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半时。体念仁心，正位凝神，如鼎之镇。

三、早起：黎明即起，醒后不沾恋。

四、读书不二：一书未点完，断不看他书，东翻西阅，不得要领，每日以十页为率。

五、读史：丙申购二十三史，嗣后每日点十页，从不间断。

六、谨言：刻刻留心，是工夫第一。

七、养气：气藏丹田，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

八、保身：节劳、节欲、节饮食，时时当作养病。

九、日知所亡：每日记日记一则。

十、月无忘所能：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积理之多寡，养气之盛否。不可一味耽着，最易溺心丧志。

十一、作字：早饭后，作字半小时，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课程，不留待明日，愈积愈难清。

十二、夜不出门：旷功疲神，切戒切戒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，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：每日临帖百字，抄书百字，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，多则不论。自七月至今，五个月内，已看《王荆公文集》百卷，《归震川文集》四十卷，《诗经大全》二十卷，《后汉书》百卷，皆笔加圈批。他的修养方法，便是时刻检讨自己，力求心安理得，努力上进。

孝道仁爱

曾国藩对父母祖父母至孝，凡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，无不谨守毋违，且为文记之，以示子弟，传为家训。至于笃爱昆弟，始终不渝，盖出自天性。

曾麟书有五个儿子，长国藩，字涤生；次国潢，字澄侯；次国华，字温甫；次国荃，字沅浦；次国葆，字事恒。曾公对于四个弟弟，爱护备至，因战事关系，对九弟国荃，尤为关心。国荃排行第九，故称九弟，军中呼为九帅。国藩任京官时，九弟即同住在京，教督甚严。国荃才大、志大、魄力大，然近于傲，国藩常以“长傲多言，为致败之凶德”戒之；国荃喜发牢骚，国藩则以“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”戒之；国荃作战，过于猛进，国藩则以“稳守稳打，不轻进，不轻退”戒之；国荃于半年之中，七拜国恩，国藩则以“斗斛满则人概之，人满则天概之”戒之。有弟如此，不愧为兄；有兄如此，弟之幸也。因为兄弟相见以诚，合作到底，故能成大功，立大业。

清廉

读书做官，做官发财，几乎变成了一个体系，不可分割。可是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京内官，京外官，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。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，他认为发这种财，是最可羞可恨之事。

曾公做京官十年，总是过着贫困的生活，直到最后才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，寄回家中，且吩咐须以四百两分赠亲戚中的贫穷者。至于后来带兵多年，做了总督，也从来不取公家一丝一毫以自肥。曾谓“余初带兵之时，立志不取军营之钱，以自肥其私，今日差幸不负始愿。”

曾国藩的军事谋略

我国历来推崇文武合一的教育政策，文人带兵，在当时议起来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后来由于文武分途，带兵一事，便由军人专负其责，文人不予过问。有人说：“五百年以来，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，只有两个人：一为明朝的王守仁，一为清朝的曾国藩。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；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，磨炼成功；都是在戎马倥偬之间，读书为学不倦。”现仅将曾国藩的军事谋略，分述于后。

湘军的成长壮大

在曾国藩未带兵前，早已明白当时绿营军的腐败不堪，力主裁汰冗员，以待急用。他奉命镇压太平军时，觉得无兵可用，非另组劲旅，否则是无法完成任务的，这才有成立湘军之议。当时许多将领带兵和作战的经验，都比曾国藩多，可另树新军之胆识，则都不及曾国藩。

在太平军攻下武汉顺流而东以后，清廷委派各省办理团练的大臣，共有四十三人之多，曾国藩不过四十三人中之一人。为什么那些团练大臣，均无成就？原因在于他们墨守成规，不能开创局面。即以团练本身而言，曾国藩是主张“团而不练”的，“团”即保甲法，专事清查户口，检举境内坏人。“练”则筹饷筹械，反足滋扰地方。他自己是一个负责办理团练的人，可是他对团练的印象极坏。如必欲地方招募丁勇，则饷械须由政府供给，始免发生流弊，此是曾国藩积极编练湘军的又一原因。

湘军既已成立，曾国藩乃撰写《书生之见》，提示仁礼治兵的理论。以仁礼治兵，的确是儒学之至精，儒学之要领。曾国藩本着“说法齐顽石之头，苦口滴杜鹃之血”的精神，勤加训练，不仅在营要做良兵，还要出外能做良民。“我辈带兵勇，如父兄带子弟一般，无银钱，无保举，尚是小事；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；因嫖、赌、洋烟而坏身体，个个学好，人人成材，则兵勇感恩，兵勇之父母妻子，亦感恩矣。”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何况血肉做成的人？曾国藩以仁礼治兵，果然获得成功。

选将四标准

曾国藩因欲建立仁礼之师，因此对于军官的选择，特别慎重。他选择军官的标准有四：“第一要才堪治民；第二要不怕死；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；第四要耐受辛苦。四者似过于求备，而苟缺其一，则万不可以带勇。带勇须智勇深沉之士，文经武纬之才！”

除此之外，曾国藩还有一个选将的标准，就是不用喜说话的人。“将领之浮滑者，一遇危险之际，其神情之飞动，足以动摇军心；其言语之圆滑，足以淆乱是非。”故湘军历来不喜欢善说话之将。

至于选兵的标准又如何呢？曾国藩在湘军营规中，早已明白规定：“募

招须择技艺烂熟、年轻力壮、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。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，有衙门气者，概不收用。”

重视思想战

曾国藩不但在用人上有一定的标准，在作战上也有针对作战实际制定出的方法。战时他所进行的第一步工作，常常是“安民”。他刚率湘军时，湖南太平军大军压境，官军节节失利，曾国藩练军未成，抵抗无术，而湖南人心浮动，四处乱逃。如果老百姓逃光了，还有什么兵可练？什么仗可打？曾国藩看到这个局面，实在难以支持，乃作《莫逃走》的安民歌，四处张贴。同时派了许多“宣传员”，劝慰老百姓，不要乱逃乱跑。这个《安民歌》，果然收效甚大，一时人心大定，静候曾国藩的指挥。

第二步工作，便是纪律严明。曾国藩深知必须从精神上唤起兵勇之自觉，始能对抗太平军。他公开承认所谓训练，“练者其名，训者其实。”他几乎无日不向士兵训话，苦口婆心，开诚布公，劝导士兵严守纪律，爱护百姓。他的训练教本，就是他自己所作的《爱民歌》，每天逐字逐句，详加剖析，不到三个月工夫，全部湘军均受感化，湘军纪律，已非当日一般练营可比。

用兵稳扎稳打

曾国藩不是战场能手，他只能将将而不能将兵；他长于死守而不长于进攻，这是一致的评论。然而，初则为责任所驱使，继则骑虎不能下背，在这种生死决斗当中，曾国藩发明了一个战胜敌人的秘诀，就是稳扎稳打。

稳扎，就是扎营的地方，必须稳稳当当，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他亲订扎营之规八条，任何部队，必须按照这规定去做。不按规定去做虽胜不赏，按照规定去做，虽败不罚。湘军每到一处，必须按照规定尺寸大小、距离深浅，做好工事。工事做好了，一营兵可以做三营兵之用，用这种手段对付流动无常的太平军。

稳打，就是打仗“不慌不忙，先求稳当，次求变化”。曾国藩曾手订“开仗五条”，“打仗要打个稳字，贼呐喊，我不呐喊；贼开枪，我不开枪；贼来冲扑时，扑一次，我也站立不动，扑两次，我也站立不动，稳到两个时辰，自然是大胜仗。”他坚持这个稳字诀，取得了很好的作战效果。

稳扎，就是“扎硬寨”，死不投降。湘军守长沙，守南昌，守祁门，即如此。稳打就是“打死仗”，死不退却。湘军攻田家镇，围安庆，取南京，均是如此。因为能守，所以能攻；因为能攻，所以能胜。

稳打并不是挨打，只有招架之功，而无还手之力，稳打仍须操主动。“我常为主，敌常为客；主气常静，客气常动，客气先盛而后衰，主气先微而后壮，故善用兵者，最喜为主，不喜作客”，这是曾国藩作战之要诀。胡林翼谓湘军愈老愈坚，其理在此。

曾国藩的读书治学

处艰难困厄之地，功名战阵之间，仍不愧为学人的，莫过于湘乡曾国藩。他的学行与事业都是成功的。他读书治学的工夫，似可从下列各方面去研讨。

第一是刻励。从他的父亲起，一贯做的是困学之功。曾国藩的科名，虽然比他父亲来得顺利，而求知深造的精神，并没有一刻放松，读书的兴趣益浓。他有几句自警的联语，如“养活一团春意思，撑起几根穷骨头”。“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，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”。就是要在任何环境中，刻苦读书。

第二是求友。他作京官的时候，没有一些无谓应酬，却专门访求知名饱学之士。当时的一些品端学邃的贤士大夫，都是他的师友。我们现在读到他与朋友往还的诗词函札，仿佛可以看到他谨严的交际生活。后来领兵出征，而随时随地网罗人才。两江总督署内的幕友，可说是“群贤毕至”。他督师部下，多喜用亲笔书函，不全用公牍，政事、文学，蔚为大观。所谓作之君、作之亲、作之师的要领，完全实践。

第三是虚心。他总认为自己的学识不够，修持不够。推重僚辈，推崇古人。他常向儿子纪泽说，他对于天文学、算学与书法没有造就，引为极大的缺憾，要其子纪泽勉力用功，为他弥补。

第四是有计划。他一登仕途，就以天下为己任，在学术上当然要有一番准备工夫。他有机会参与内廷的密政。政府的典章制度，也可以审阅，就是秘藏的珍本，也可披读。曾国藩也注重实地考察，增加感性知识。了解地方的风土民情，山川要塞，政治人物，经济生活。后人看到《曾文正公全集》洋洋数百万言，算是著作等身。其实分析起来，全因为他有一颗恒心，经年累月，积渐而成。现将曾氏的著述，分次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诗文集》 这是他心血的结晶，有散文，有词章，在桐城派中，可谓集大成者。惜篇幅不很多。

二、《函札》 这是与友人或部僚论学论事的的文章，极有价值。

三、《家书》 这是曾氏伦理上极有成就的表现，可作经典，可备史乘。

四、《日记》 这是生活的纪录，有德性的流露与修持，有事功学术的记载，占曾氏著作中的很大比重。

五、《奏稿》 这是公牍，也许有些是幕友们代笔。

六、《经史百家杂抄》 这是读书选辑。

七、《十八家诗抄》 这是读诗选辑。

我们如果读书，则六、七两项，自可编订。我们如果从政，则第五项亦可摘录。我们如果有一定的阅读能力，而又很勤勉，则一、二、三、四各项，都可做案头常读之书。

曾氏读书甚多，但在他的日记中常常提到有心得的，数目并不很繁，且时时以专和精自警。

生活中的曾国藩

曾氏从政、统军，注意严格自律。即使是日常休闲生活，也有为人称道之处。

生活习惯

因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，其生活情趣亦有别。曾氏农家子弟出身，虽入官场，但未沾染当时的官僚习气，始终保持其祖父之遗规。曾国藩有致夫人书云：“作官不过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长久之计。”故曾氏虽居要显，节俭亦如常人，尤其是生活习惯，亦不加改变。

拿早起来说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尝云：“早起是千金妙方，长寿金丹也。吾近有二事法祖父。一曰早起，二曰勤洗脚，似乎于身体大有裨益。”又其子纪泽新婚未久，曾氏恐其不能早起，特致书云：“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，吾得见祖父、父亲皆未明即起，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，始见天亮。黎明即起，有事则不待黎明，每夜必起看一、二次不等，此尔所及见者也。尔弱冠授室，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，自力行之，亦率新妇力行之。”所以曾氏不仅自己早起，也希望保持早起的家风。

曾氏虽然早起，但不午睡，惟其要在晚间读书治事，所以他学父亲之法，在傍晚小睡片刻，以休养体力精神。曾氏尝云：“余少时读书，见父亲日入之后，上灯之前，小睡片刻，夜间精神百倍，余近日亦思法之，日入后于竹床上小睡，灯后治事，果然爽快。”

除早起，傍晚小睡片刻之外，曾氏每日三餐之后，必徐行三千步，晴则散步庭园，雨则绕室而行，在这段散步时间内，不谈公事。

休闲活动

就曾氏的生活习惯而言，曾氏的公馀生活严肃而有规律。曾国藩在三十二岁以前吃潮烟。潮烟在那时像今天的香烟一样流行，分水、旱两种吸法。据吸过潮烟者说，烟味清芬，刺激不大。只是携带不便，纸烟流行后便没落了。那时京官吸烟很普遍，但曾氏还是决心戒绝，他在日记中写到戒烟时“自戒潮烟以来，心神仿佛，几若无主，遏欲之难，类如此矣！”曾氏意志坚决，这一小嗜好遂为之戒绝，嗣后以此勉家人谓：“余三十几最好吃潮，片刻不离，至道光壬寅，立志戒烟，至今不再吃。”

曾氏戒烟成功，但戒围棋却未见效。本来围棋是我国士大夫所喜爱的一种休闲活动，曾氏嗜此尤笃，每非此不乐。但围棋甚耗精力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细思近日之所以衰颓，因于年老日衰之故，亦由于围棋太多，读书太多，目光昏涩，精神因之愈困也。嗣后当戒围棋，每日静坐时计，以资

调摄。”又云：“近来每日围棋一局。费精力，日中动念之时，夜间初醒之时，皆萦绕于黑白之上，心血因而愈亏，目光因而愈蒙，欲病体之渐痊，非戒棋不为功。”曾氏做任何事皆有决心，惟戒棋却不十分认真，今日戒，明日又下。相传曾氏逝世前一天仍下二局棋，可见曾氏嗜此道之深。一种成为嗜好的高尚休闲活动，何必戒去。曾氏日记云“至海秋家，见人围棋，跃跃欲试，不仅如见猎之喜。”由此来看，曾氏戒棋乃是一时之感慨，并非真决心将之戒绝罢了。

《曾国藩日记》在曾氏的所有著述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曾国藩去世后仅四年，即有人将其日记编辑成书，广泛流传，颇获读者好评。《曾国藩日记》的主要特点是：

一：真实 鲁迅曾说：“我本来每天写日记，是写给自己看，不须摆空架子，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。”曾国藩的日记直抒胸臆，畅言无忌，坦率无隐。惟其真，才显露出特殊的魅力，对读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。宦海青云的手腕，辟祸趋福的心得，领兵打仗的谋略，读书治学的体会，对人对事的看法，理财教子的事例，难与人言的隐私，交际应酬的方法，修身治家的甘苦，均无遗漏，记载甚详。从曾国藩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个站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曾国藩。这些记载着曾氏真情实感、实录作者生活经历的文字，在曾国藩的生前则根本不可能公之于众。读者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心路历程，找到他成功的原由。

二：珍贵 日记中记载了一些其他史料中均未见到的史实，具有弥足珍贵的不可或缺的文獻史料价值。例如，曾国藩攻陷天津并任两江总督四年后，奉慈禧太后之命进京朝见，日记中即有详细的记录。慈禧太后于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年底一连三次召见，曾国藩用白话文亲记如下：

十二月十四日，五更起，寅正一刻也。饭后趋朝。……在九卿朝房久坐。奕公山带领余人养心殿之东间，皇上向西坐，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。慈安太后在南，慈禧太后在北。余人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。旋免冠叩头，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，起行数步，跪于垫上。

太后问：“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？”

对：“办完了。”

问：“勇都撤完了？”

对：“都撤完了。”

问：“遣撤几多勇？”

对：“撤的二万人，留的尚有三万。”

问：“何处人多？”

对：“安徽人多，湖南人也有些，不过数千，安徽人极多。”

问：“撤得安静？”

对：“安静。”

问：“你一路来可安静？”

对：“路上很安静。先恐有游勇滋事，却倒平安无事。”

问：“你出京多少年？”

对：“臣出京十七年了。”

问：“你带兵多少年？”

对：“从前总是带兵，这两年蒙皇上恩典，在江南做官。”

问：“你从前在礼部？”

对：“臣从前在礼部当差。”

问：“在礼部几年？”

对：“四年，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，咸丰二年出京。”

问：“曾国荃是你胞弟？”

对：“是臣胞弟。”

问：“你兄弟几个？”

对：“臣兄弟五个，有两个在军营死的，曾蒙皇上非常天恩。”

问：“你从前在京，直隶的事自然知道？”

对：“直隶的事，臣也晓得些。”

问：“直隶甚是空虚，你须好好练兵。”

对：“臣的才力怕办不好。”旋即头退出。

曾国藩与慈禧太后的神态，跃然纸上。

又如曾国藩于1870年处理完“天津教案”之事后，举国皆曰可杀。曾氏抱有病之躯离京再任两江总督。又记录了一次与慈禧太后的谈话：

已正三刻，入养心殿之东间，叩谒皇太后、皇上圣安。旋即叩头恭谢天恩。

西太后问曰：“尔何日自天津起程？”

对：“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。”

问：“天津正凶已正法否？”

对：“未行刑。旋闻领事之言，俄国公使即将到津，法国亦将派人来津验看，是以未能遽杀。”

问：“李鸿章将于何日将伊等行刑？”

对：“臣于廿三夜接李鸿章来信，拟以廿五日将该犯等行刑。”

问：“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？”

对：“此时百姓业已安谧，均不好事。”

问：“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？”

对：“右目无一隙之光，竟不能视，左目尚属有光。”

问：“别的病都好了么？”

对：“别的病算好了些。”

问：“我看你起跪等事，精神尚好。”

对：“精神总未复原。”

问：“马新贻这事，岂不甚奇？”

对：“这事很奇。”

问：“马新贻办事很好。”

对：“他办事和平精细。”旋即退出殿门以外。

三：内容丰富、具体 《曾国藩日记》的内容十分丰富，记述十分具

体。上至国家大事，下至居家理财，问学，修身，从政，军谋，伦理，论子、史、诗、书、经、文，赏书画、碑帖、图籍、古玩，颐养游览、思念感伤，均有所涉猎。曾氏从其未登仕途起至逝世前一天，逐日撰写日记，容量极大。真知灼见，俯拾皆是。如他在同治七年四月的日记中有“居家四败”之说：“居家四败，曰：妇女奢淫者败。子弟骄怠者败。兄弟不友者败。侮家慢客者败。”令人深思不已。曾氏为人严谨，做事认真。记述翔实具体，一般的事件记载时均写出细节及时间、地点，体现出曾氏务实的作风。

本书收集整理了现存的曾国藩日记 2409 篇，参照历史上不同的版本进行了校勘。为使读者对照阅读，将日记原文全部译为准确生动的白话文。为便于读者查阅、检索、研读，将日记分为“修身之道”、“交际之道”、“理财之道”、“治军之道”、“为政之道”、“治学之道”六类。各类内日记以年代先后为序，基本包容了曾国藩日记中的精华。

曾国藩将写日记当作每日必修之功课。至逝世前一天仍记日记。他对日记颇为重视，要求甚高：“写日记，须端楷，凡日间过恶，身过、心过、口过、皆记出，终日不间断。”《曾国藩日记》是曾国藩生命中的重要部分。古为今用，在曾国藩逝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《文白对照全译〈曾国藩日记〉》将会使广大读者感受到它存在的价值。

愿读者指正。

编者

1999 年 12 月于北京